

服务贸易壁垒测量的体系与框架

黄建忠¹ 杨扬²

【内容摘要】 同以往国内外有关服务贸易壁垒量化研究的文献评述不同, 本文将量度服务贸易壁垒的各种规模指标和影响指标视为一个完整的体系, 对其进行系统的评价, 从不同方面比较各种指标的优缺点及其适用范围, 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壁垒量化研究的初步构想。

【关键词】 服务贸易 贸易壁垒 非关税壁垒 贸易自由化

【中国分类号】 F746 18 【文献标识码】 A 【本章编号】 1000- 6052 (2009) 01- 0049- 05

一、引言

广义的服务贸易壁垒包括自然壁垒和人为壁垒: 前者指语言文化差异、技术等因素对服务贸易的限制, 后者指公共政策和私人反竞争手段对服务贸易的阻碍。服务贸易壁垒在性质上更类似于货物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 主要以进口国法律和行政管制的形式存在。服务贸易壁垒种类繁多, 分类标准难以统一, 但有一共同特征: 要么限制服务提供的数量, 要么使服务提供的成本增加。

现有文献对服务贸易壁垒的测量主要集中于两方面: 对服务贸易壁垒规模的量度 (规模指标), 及其对经济影响的量度 (影响指标)。综观服务贸易壁垒量化研究的文献, 范围最窄的只涉及特定国家特定行业的某一类规模指标, 最宽的则覆盖多个国家、多个经济部门。不仅测量规模指标, 而且在此基础之上计算影响指标。

二、服务贸易壁垒测量体系: 规模指标与影响指标

(一) 服务贸易壁垒规模的测量

1. 频率指标

最早构造服务贸易壁垒频率指标的是 Hoekman (1995)。他以 GATS 各成员国的承诺时间表为依据, 把所有承诺分为三大类并赋予各个类型以不同的分值, 即开放/约束因子: (1) 如果承诺对特定部门的

特定提供方式不作任何限制, 得分为 1; (2) 如果对特定部门的特定提供方式列出具体的限制, 得分为 0.5; (3) 如果未对特定部门的特定提供方式作任何承诺, 得分为 0。GATS 列出了 155 个互不重合的服务部门, 每个部门的服务都可以以四种方式提供, 因此, 对应全部部门/模式, 各成员国都有 $1554 = 620$ 个开放/约束因子。根据这些因子, 可以计算得到三类国家 (部门) 覆盖率指标, 也称 Hoekman 指标: (1) 用一国在 GATS 时间表中所做承诺数除以最大可能值 620; (2) 经开放/约束因子加权的所有部门/模式除以最大可能值, 也称平均覆盖率; (3) 把没有承诺定义为 0, 即这一类部门 (模式) 被视作成员国不准许国外服务提供者进入的领域。

这些覆盖率指标的设计, 最初是为了对 GATS 各成员国作出的承诺进行量化分析。Hoekman 认为, 覆盖率越接近于 1, 意味着政府越倾向于在服务领域采取自由贸易政策, 因而也往往意味着越高的实际服务贸易开放度。因此, Hoekman 指标也被视为贸易限制指数。

其后在澳大利亚团队的推动下, 除对 Hoekman 指标的进一步改进之外, 研究者们还陆续构造了一系列针对不同部门的频率指标, 也称贸易限制指数。尽管采用了不尽相同的信息来源和评分标准, 大致编制方法基本相似。信息来源主要是各国服务领域贸易和

收稿日期: 2008 年 11 月 1 日

作者简介: 1. 黄建忠,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厦门, 361005。

2. 杨扬,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博士生。研究方向: 国际贸易。厦门, 361005。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2006JDXM207) 的部分研究成果。

投资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献,一些较为系统的相关问卷调查和访谈记录,以及国际组织、行业协会或咨询公司等的研究报告。鉴于服务贸易壁垒的多样性、隐蔽性和复杂性,不同处的信息往往被综合运用。研究者们根据这些壁垒的性质及其对服务贸易的限制程度,给它们分别赋予不同分值并归入不同类别,然后,每一个类别又被赋予一个权重,由此计算出各国针对不同部门、不同提供方式的贸易限制指数。这些分值和权重的赋值通常是研究者根据自身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对各类壁垒所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主观判断的产物,也有一部分研究运用了因子分析法或主成份分析法等统计学方法计算权重。

总之,在 Hoekman 指标或其它贸易限制指数的基础上,通过给贸易限制指数最高或最低的国家赋予一个少带有猜测成分的关税等值作为基准,可以对各国的相对关税等值进行比较。

2. 数量指标

构造服务贸易壁垒数量指标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计量模型的估算,比较没有壁垒情况下的贸易额与实际贸易额。通常人们会根据标准的贸易模型构造一种接近自由贸易的理想情形,用计量经济模型估计残差(实际贸易水平与模型预测水平差额)或以各种虚拟变量度量壁垒规模。这类研究在货物贸易领域屡见不鲜,而服务贸易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两项: Francois 和 Hoekman (1999) 和 Warren (2001b)^[1]。前者用引力模型估计了美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双边服务贸易额,自变量包括人均收入、国内生产总值和一个西半球虚拟变量,并以香港和新加坡作为自由贸易的基准,将实际进口额和计量模型所拟合的进口额差值标准化之后用于度量壁垒的规模。同时把所得差额与假设的需求价格弹性相结合,估计出相应服务部门的关税等值。后者用一个计量模型对 136 个经济体电信服务的消费,估计了贸易与投资壁垒对数量的影响。他选取的自变量包括人均收入、网络质量、等待列表、家庭密度、人口密度和贸易与投资壁垒。把现有壁垒效应数量估计值与假设的需求价格弹性相结合,计算出价格差形式的关税等值。

3. 价格指标

由于各国服务产品和市场结构的异质性,以及服务价格数据可获得性问题,很难在比较同类服务国际和国内价格基础上直接估算服务贸易壁垒的关税等值。通常采用营业毛利率法和计量方法对服务贸易壁垒的规模进行间接测度。

Francois 和 Hoekman (1999) 提出根据营业毛利率构造价格工具,也称财务指标。营业毛利率显示了不同行业的相对获利性,从而显示了可能存在的进入壁垒的相对大小。Hoekman (2000) 指出,用这些利润量度的服务贸易壁垒规模可用于把样本国利润率与“自由贸易”基准国平均利润率做比较,或以制造业为基准进行比较^[2]。

以澳大利亚生产率委员会为代表的各项研究用计量方法计算了多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壁垒价格指标,被考察的行业包括航空运输、食品批发与零售、银行、海运、工程服务、电信、工业供电等。考虑到价格和数量效应可能与各种潜在限制有关,他们利用计量经济技术区分了贸易限制指数和其它因素各自对价格和成本的影响。鉴于各个行业的经济特征和规制政策存在很大差异,针对不同行业的计量模型采用了极其不同的控制变量。同时,很多研究根据对贸易壁垒的不同分类方法,区分了不同种类的贸易限制指数,由此得到的参数估计值又可作为权重值,反过来改善贸易限制指数本身的准确度。

(二) 服务贸易壁垒经济效应的测量

影响指标所量度的是服务贸易壁垒的存在或者削减(拆除),对国家和行业内部(之间)竞争条件、生产率、资源配置和福利所产生的经济影响。首先根据经济理论构建一般均衡(CGE)或局部均衡模型,模拟消费者、生产者和政府之间的交互作用^[3]。以前面所提到的几种规模指标之一作为参数值对模型进行校准之后,便可以计算贸易壁垒的经济效应了。例如,可以把削减 15% 贸易壁垒或完全自由贸易下的经济变量模拟值和实际值进行比较,估算贸易壁垒对经济的影响。

用局部均衡模型,测量特定部门服务贸易壁垒经济效应的文献主要有 Rathindram (2003) 关于基础电信领域改革的研究等。Rathindram 的研究涵盖了全球 86 个发展中国家 1985-1999 年间的数据库,研究的重点是:(1) 所有权、竞争和规制方面的政策变化;(2) 任意一类政策改革和其它互补性改革措施的搭配;(3) 改革次序对三者的经济影响。主要结论是:(1) 私有化和竞争的引入显著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以及电信主线的密度;(2) 私有化和竞争政策在同时采用的时候可以通过互动而达到最优效果;(3) 在私有化之前引入竞争效果更佳。这一研究方法同时关注一个行业的政策和市场结构,可以有效运用于对某种特定服务贸易壁垒的评估。

和针对特定部门的局部均衡模型不同,一般均衡模型可用于分析贸易壁垒和相关政策对多个国家、多个部门的经济影响。最常用的两类模型是 GTAP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和密歇根模型 (Michigan Model of World Production and Trade)。目前常用的建模方法主要包括: (1) 分析随着服务壁垒递减而发生的跨境服务贸易自由化; (2) 假设 FDI 是贸易自由化或者其它外生变化的结果; (3) 模拟跨国公司母公司和附属公司之间的联系, 以及特定国家或地区内, 国外公司和国内公司之间的区别。

三、现有体系的评价

(一) 规模指标评价

1. 频率指标

对于 Hoekman 指标和始于澳大利亚团队的贸易限制指数, 可从信息含量、数据与资源要求、准确性以及适用范围等方面加以比较。

Hoekman 指标的唯一依据是 GATS 各成员国的承诺时间表, 而贸易限制指数则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 关注实际政策法规以及实际起作用的壁垒。因此, 就信息含量而言, 通常认为后者优于前者。但显然, 为了广泛收集信息并编制详细的加权/评分系统, 贸易限制指数对数据与资源的要求也高得多, 在缺乏相关数据与资源的情况下, 许多研究仍然不得不采用原始或经改进的 Hoekman 指标。

在准确性和可靠性方面, 两类指标各有利弊。贸易限制指数的编制依据是实际壁垒, 对加权(评分)系统的赋值也基于研究者对壁垒严重程度及其经济影响的判断, 这一反映实际壁垒规模的倾向使之具有比仅基于 GATS 承诺的 Hoekman 指标^[4]更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但是在其编制过程中, 不论对政策法规的收集, 对调查方法的选择, 还是对加权(评分)系统的赋值, 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 是对研究者个人知识、信念和能力的反映。相对而言, Hoekman 指标因其唯一的信息来源而留有较少个人主观判断的空间, 反而更显客观。而且由于其所涵盖的范围比贸易限制指数更广, 因而具有更强的行业间可比性。

综上所述, 贸易限制指数更适用于对特定行业的研究, 而当研究涉及多个国家、多个行业, 且缺少具有可比性的详细数据时, 则可以借助 Hoekman 指标。

2. 数量(价格)指标

数量(价格)指标比频率指标的信息含量更为丰富, 不仅能够反映显性壁垒, 而且能够反映频率指标通常无法捕捉到的隐性壁垒。但数量/价格指标对数

据和资源的要求也更高, 而且不同服务部门之间的可比性通常较差, 限制了其使用范围。Francois 和 Hoekman (1999) 提出的营业毛利率法是一个重要的例外, 适用于跨部门和跨国的比较。但数量(价格)指标并不适用于所有经济体。例如, 财务指标可用于研究已达到一定开放程度的市场经济国家, 特别是在没有新的国内竞争者而只有国外竞争者进入市场时, 毛利率的下降幅度可以较好体现壁垒削减的真实程度。而在具有浓重计划经济色彩或政府干预很强的国家, 价格信号严重失真, 很难用毛利率法或价格指标衡量开放前后贸易壁垒的规模。此外, 在发展中国家, 某些行业在开放之初完全处于空白, 数量(价格)指标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

(二) 影响指标评价

影响指标全面显示了消费者福利、生产者利润、生产率、竞争状况和资源配置等如何随政策变化而变化, 在涵盖范围和信息含量等方面优于规模指标。迄今为止, 影响指标是分析贸易壁垒和贸易自由化对整体经济影响的唯一工具, 能够为政策制定者在服务贸易的开放次序和开放速度等方面提供具有一定参考价值的信息。

然而, 对大量数据和资源的需求, 以及分析结果对模型假设和结构的高度依赖, 又使影响指标的精确性和可信度大打折扣。实际上, 作为局部均衡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数据的规模指标, 本身已经存在或多或少的精确性问题, 在此基础上所计算出的影响指标很可能会进一步放大这些误差。而且, 无论测量影响指标的理论和技术如何发展, 研究者在认识和信念上的差异必然导致研究结果的差异。再加之经济模型所固有的专业性和复杂性, 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目标冲突, 影响指标显然难以用提供比较信服的依据。

(三) 时效性问题

现有研究普遍存在一定的时效性问题。对规模指标和影响指标的已有测算, 都仅仅是对特定时期内服务贸易壁垒的近似反映, 而真正系统的研究必须具有连续性, 能够充分反映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推进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 限制服务贸易的相关政策法规必然有所变化, 对 GATS 的承诺在各国得到不同程度的兑现, 一方面,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总趋势有利于逐步降低各国的公共政策壁垒, 另一方面, 随着旧壁垒的拆除, 一些新壁垒随之出现。除政府和相关部门所出台的新规定中不易被察觉的隐性壁垒之外, 私人反竞争行为也不容忽视。而且, 新壁垒往往是贸易自由化

的副产品。例如，有实力的国外服务提供商进入一国市场之后，可能滥用其市场势力，通过合谋等手段形成新的垄断。因此，必须不断更新数据和信息，加入合适的变量，才能更为及时准确地反映服务贸易壁垒的规模及其后果。一般而言，频率指标往往更适用于考察开放的起步阶段，而数量（价格）指标则能够更为准确地反映开放的结果。

四、对未来研究的若干构想

1. 引入结构指标。以同样计算方法所得到的同等水平频率指标所表示的贸易壁垒，如果其内部构成不同（或者嵌入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可能产生极为不同的经济影响。没有对结构的把握，仅凭简单的规模指标，很难进行跨国、跨行业以及跨时期的有效比较。因此，有必要尝试引入某种能够反映贸易壁垒结构的指标，作为对贸易限制指数的补

充。在把复杂的结构信息转化为结构指标的过程中，对服务贸易壁垒的恰当分类是结构界定的基础。笔者认为，至少可以编制两大类型的结构指标，即名义测度指标与各种结构指数。名义测度变量分两步构造：（1）获取尽可能全面的有关贸易壁垒的信息，或利用为计算贸易限制指数而收集、整理的现成信息；（2）对信息加以处理，根据不同阶段各国、各行业壁垒的结构特征对其进行分类，结构相似者归入同一类型，并给不同类型赋予不同的数值编码，这些编码只是一个符号，数值之间一般不存在有实际意义的数量关系。结构指数可根据研究的具体需要具体设计，指数所取的数值之间通常有明确的数量关系。结构指标和频率指标二者基本是并列关系，都可以作为计量模型或其它数学模型的投入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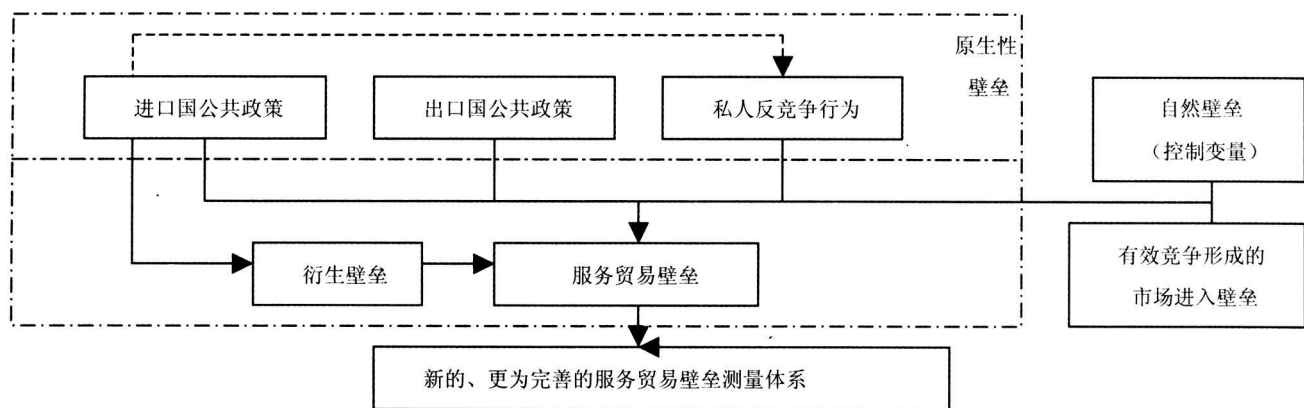


图1 服务贸易壁垒形成的过程

2. 区分不同性质的进口壁垒。目前，多数研究更为关注公共政策壁垒。实际上，除政府设立的原生性壁垒之外，还存在很多导致市场偏离竞争性均衡的二次壁垒（衍生壁垒）或其它壁垒，且后者会对前者产生强化或改造的作用：（1）当低效率的本国服务提供商在政府保护下，因免于竞争的创造效应而成长壮大后，即使限制国外竞争的政策被取消，这些“毕业”的幼稚产业仍然可能生存、盈利，并对更有效率的国内外潜在竞争者构成壁垒，减少消费者福利，在这种情况下，被拆除的原生性壁垒将产生持久的负面影响；（2）开放过程中，国外服务提供者采取的私人反竞争手段带来新的壁垒。除这些人为壁垒之外，当有效率的市场竞争本身导致其中佼佼者胜出时，也会构成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的又一重壁垒。同一行业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演化出不尽相同的市场结构和在位企业间技术和规模的差异程度，由此影响成本、价格和

营业毛利率等经济指标。基于以上原因，通过不同国家与基准国比较所确定的关税等值是值得怀疑的。应该通过技术手段的创新和数据收集的加强，推进对不同性质壁垒的识别和量化研究。

3. 测量出口壁垒。服务贸易壁垒不仅存在于进口领域，也存在于出口领域。以高等教育为例，其最常见的服务提供方式是境外消费，一国移民管理部门对学生签证的过高收费和对签证发放的限制，以及教育部门对外国学生入学资格的特殊要求以及额外收费等，均构成该国高等教育出口的壁垒。如何区分进口壁垒、出口壁垒、出口促进措施，以及其它因素对贸易流量和价格的影响，将是此类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已有的规模指标和影响指标，经改造之后都有可能被用于对出口壁垒的研究。

（责任编辑 林珊）

注释:

[1] [2] 俞灵燕. 服务贸易壁垒及其影响的量度: 国外研究的一个综述 [J]. 世界经济, 2005 年第 4 期。

[3] 在一般均衡模型中, 还必须考虑各个行业之间的联系。

[4] Hoekman 指标的评分方法存在两大缺陷: 首先, 成员国未在 GATS 的承诺时间表中就特定行业的特定提供方式作出承诺, 并不意味着该国在该行业一定存在壁垒; 其次, 对所有的限制措施赋予同样分值 (0.5), 并不能够准确体现这些限制的实际经济影响。

参考文献:

[1] 邓力平、陈贺菁. 服务贸易壁垒规模的测量: 文献回顾与评析 [C]. 全国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暨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论坛会议论文集, 2007。

[2] 刘莉、黄建忠. 服务贸易自由化: 多边主义还是区域主义 [C]. 全国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会议暨国际贸易学科发展论坛会议论文集, 2007

[3] Banga, Rashmi, 2005, Trade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s: A Review, ICRIER Working Paper.

[4] Braga, Carlos A. P., 1996,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Service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Finance &

Development, March 1996.

[5] Deardorff, Alan V. and Stern, Robert M., 2004, Empirical Analysis of Barriers to International Services Transaction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Liberalization, Discussion Paper No. 505, www.fordschool.umich.edu/rsie/workingpapers/wp.html.

[6] Dee, Philippa, Measuring and Modelling Barriers to Services Trade: Australia's Experience, paper prepared for APEC funded workshop on Quantifying Non-Tariff Measures, Bangkok, 8-10 October 2003.

[7] Dihel, Nora and Shepherd, Ben, 2007, Modal Estimates of Service Barriers, OECD Trade Policy Working Papers, No. 51, OECD Publishing.

[8] Fink, Carsten, Aaditya Mattoo, and Randeep Rathindran., 2003, An Assessment of Telecommunications Reform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Information Economics and Policy 15: 443-66.

[9] Hoekman, Bernard and Braga, Carlos A. Primo, 1997, Protection and Trade in Services: A Survey, Open economies review 8: 3285-308.

[10] McGuire, Greg, 2000, Measuring and Modelling Restrictions on Trade in Services, notes submitted by the Australian Productivity Commission to the OECD.

Quantifying Barriers to Trade in Services: Taking Stock, Looking Ahead

Huang Jiarzhong Yang Yang

Abstract: Unlik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reviews on the measurement of barriers to trade in servic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this paper regards the size measures and impact measures as an integrated system. Based on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system and its components, we evaluate the strengths, weaknesses and appropriate applications of all the measures. We believe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improve and extend the current system in four ways.

Key Words: Trade in Services; Barriers to Trade; Non-Tariff Barriers; Trade Liberalization